

句为“五十弦从波上来”一句，丝毫不觉牵强。后诗写月下忆人，这原是温、李诗歌中习见的题材，吴融以赋的手法写来，清空而不绮艳。颈联将昔日的繁华与眼下的凄独绾合起来，笔致流利动荡，过渡十分自然。前诗意境近十才子，又有香山语言轻灵的特点。后诗流转跳脱近香山，而情调淡远又似十才子。吴融诗歌豪宕不及白居易，细腻不及十才子，要亦折衷二者之间，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白居易的率易和十才子的贫弱。

《四库全书总目·唐英歌诗》评曰：“以文章工拙论之，则（吴）融诗音节谐雅，犹有中唐之遗风，较（韩）偓为稍胜焉。在天佑诸诗人中，闲远不及司空图，沈挚不及罗隐，繁富不及皮日休，奇僻不及周朴。然其余作者，实罕与雁行。”指出了吴融诗歌独特的面貌及在唐末诗坛上的地位，其见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两个哈代”

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在其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浓重的宿命色彩和悲观情绪，这已作为定论出现在各种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许多研究评论文章之中。确实，作为小说家的哈代，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是悲观的：“人无力反抗冥冥之中力量的安排，除了俯首听命，没有别的办法。”（《无名的裘德》）哈代小说人物，象苔丝、裘德、亨察尔等都经历了大起大落，坎坷艰难的人生命运，透露出小说家自身对社会现实充满困惑、悲观和绝望的心境和情绪，对人类未来失去乐观的信念。但哈代并不是没有理想，丧失乐观的人，在能够直接抒发内心感情的诗歌领域里，他唱着向往美好明天的《希望之歌》：“从心底里相信——胜利属于正义”，“纵使人生陡变艰险，相信我也不会记挂心间！”在诗剧《列国》中，他更是坚信将来一定会铲除“面色苍白、呼吸沉重的人群的忧愁”，“使他们欢乐的日子总会来临”，一点悲观主义的影子都没有，因此作为诗人哈代，“距离绝望的悲观主义是很远的。”（苏联《英国文学史1870—1955》）甚至到了晚年，哈代还一再申明自己“单独地怀抱着希望”。还是D·H·劳伦斯说得好：“若是哈代真是厌世，真是悲观，他也决不会不倦不厌地歌唱到白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着“两个哈代”——对现实悲观失望的小说家哈代和对未来乐观憧憬的诗人哈代，我们为什么只看到“前一个哈代”呢？！

（敏捷）